Aging Research 老龄化研究, 2026, 13(10), 552-559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
https://doi.org/10.12677/ar.2026.1310791

Hans汉斯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事务协助风险与优化路径研究

李思思

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6年6月24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0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29日

摘　要

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社会参与不断深化，其日常生活逐渐嵌入家庭、社区与数字平台构成的多元支持网络之中。随着事务复杂性与数字化程度的提升，老年事务协助行为日益普遍，但同时也伴随着信任依赖增强、信息不对称扩大以及多主体协作结构复杂化等问题。本文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理论视角，从家庭、社区与数字平台三个维度剖析老年事务协助体系的运行机制，重点阐释非正式授权泛化、信息结构失衡、多层协作链条交织催生的结构性风险。研究发现，老年事务协助风险并非单纯个体失范行为，而是社会支持网络外延扩张、委托代理关系缺乏正式约束共同催生的系统性风险。基于此，本文提出优化社会支持网络结构、规范协作边界以及推进数字适老化治理等路径，以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安全性与自主性。

关键词

积极老龄化，社会支持网络，事务协助，数字鸿沟，委托代理

Research on Risks and Optimization Pathways of Elderly Affairs Assist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e Aging

Sisi Li

Law School,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une 24, 2026; accepted: October 20,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9,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tive ageing,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older adults continues to expand,

文章引用: 李思思.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事务协助风险与优化路径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10): 552-559.
DOI: 10.12677/ar.2026.1310791

and their daily lives are increasingly embedded within a multi-layered support network consisting of family, community, and digital platforms. With the growing complexity of daily affairs and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digitalization, assistance in older adults' daily affair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evalent. However, this development has also intensified reliance on trust, widened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increased the complexity of multi-actor collaborative structures. Drawing on social support network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older adults' affairs assistance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family, community, and digital platforms.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structural risks arising from the expansion of informal authorization,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multi-layered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risks in older adults' affairs assistance are not merely the result of individual behavioral deviations, but rather systemic outcomes shaped by the expansion of support networks and the informalization of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several optimization pathways, including restructuring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clarifying and standardizing collaborative boundaries, and advancing age-friendly digital governance. These measures aim to enhance both the security and autonomy of older adults' social participation.

Keywords

Active Aging, Social Support Network, Affairs Assistance, Digital Divide,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趋势。截至 2025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32338 万人，占总人口的 23.0%[1]，这标志着我国老龄人口规模巨大且老龄化进程具有深刻的复杂性与独特性。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积极老龄化理论已成为指导老年社会治理的重要范式。该理论强调，老龄化不应被视作纯粹的社会负担，而应当通过政策与社会环境的重构，持续提升老年人在健康、参与和安全等维度的生活质量[1]。在此背景下，我国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意愿与参与深度不断增强，其日常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然而，伴随数字经济与智慧城市的迅猛发展，社会公共服务与日常事务处理展现出高度的数字化、网络化与复杂化特征。从智能就医、线上金融消费到政务异地办理，技术的迭代升级在提高社会运行效率的同时，也给传统老年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冲击。

对于身处现代社会的老年群体而言，由于生理机能、认知心理以及知识储备的自然衰退，其面对充斥着算法逻辑与智能终端的数字化环境时，极易陷入接入、使用及深层认知等多重技术困境[2]。为了维持基本的社会参与并顺利解决日常生活事务，老年人不得不建立起广泛的事务协助需求，将部分或全部事务处理行为交由外部主体代为执行。

基于此，本文聚焦于老年事务协助的实际运行中，老年人、协助者与数字平台的互动关系，剖析多主体交互过程中潜藏的结构性风险。通过梳理家庭、社区和平台构成的多元协助运行现状，重点分析信任结构、信息结构以及委托代理结构中的风险生成机理，最终提出规范化、体系化的治理对策。

[1]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2. 理论基础与核心概念

2.1. 积极老龄化理论

积极老龄化理论的核心在于打破传统的“衰老消极论”，将老年人视为具备发展潜能与社会价值的积极行动者。该理论构建了一个由健康、参与、安全组成的三维核心结构[1]。其中，“健康”是开展一切社会活动的生理与心理基石；“参与”鼓励老年人依照自身需求与能力，深度融入社会经济、文化及社区公共事务中；“安全”则是兜底性保障，旨在老年人在面临身体、经济或技术脆弱性时，社会能够为其提供必要的防护网。在老年事务协助的语境下，协助行为的初衷正是为了通过外部赋能，弥补老年人因技术门槛导致的参与能力不足，从而在保障其社会参与的同时，维护其数字化生存的安全[3]。

2.2. 社会支持网络理论

社会支持网络理论主张，个体的社会适应与风险抵御能力互嵌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对老年群体而言，这一支持网络主要由三个核心维度交织而成：第一是家庭支持，作为最核心、最稳固的非正式支持系统，家庭成员通过情感反哺与行为代办，为老年人提供首要的风险缓冲[4]。第二是社区支持，属于中观层面的正式与非正式混合支持系统，通过属地化的公共服务、志愿帮扶和地缘熟人关系，承接家庭功能外溢后的社会化养老事务[5]。第三是数字支持，在智能时代催生出的新型支持形态，主要指数字平台、智能终端及适老化技术在工具层面对老年人日常生活、社交互动的在线承载与功能扩展[3]。

2.3. 委托代理关系

在社会学视角下，老年事务协助过程广泛存在着一种基于信任与角色期待的社会微观互动关系，即老年人因能力限制或特定情境需求，将自身部分事务的处理权交由他人代为执行，从而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6]。

这种关系具备以下特征：首先是非正式授权性，委托行为往往缺乏成文的制度约束，多数是在家庭、社区等传统场域中，基于亲情、邻里情谊或临时情境需求达成的口头、默许式非正式协议。其次是信息不对称性，由于老年人在新媒体素养、数字操作逻辑上的滞后，导致其与年轻一代或专业协助者之间存在天然的知识壁垒[2]。协助者掌控着事实上的执行权与信息解释权，委托人则处于执行与理解高度分离的被动状态。再次是行为替代性，协助关系的边界在长期互动中具有动态演变性，最初以工具性、教学性为主的辅助行为，在老年人依赖心理的放大下，极易逐步演变为全权主导的代行行为[5]。最后是边界模糊性，由于缺乏明确的知情确认与责任边界划分，授权的具体范围、时效以及事项边界往往呈现高度的弹性与模糊性。

3. 老年事务协助体系运行机制

老年事务协助并非单一互动模式，而是在不同社会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多类型支持关系。根据协助主体来源、信任基础以及事务复杂程度，可以将其划分为家庭亲缘型协助关系、社区互助型协助关系和平台技术型协助关系三种主要类型。这三类协助关系分别对应家庭支持机制、社区支持机制和数字平台支持机制，共同构成当前老年事务协助体系的基本运行框架。

3.1. 家庭支持机制

家庭亲缘型协助关系是老年事务协助最传统、最基础的形式。在传统反哺文化与现代家庭结构的双重作用下，家庭支持机制始终是老年事务协助的最基本途径。该类型主要体现为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帮助老年人处理数字支付、医疗预约、账户管理等事务，其信任基础来源于血缘关系与长期情感积累，具

有稳定性较强、持续时间较长的特点。

家庭支持机制主要表现为子女或小辈代办各类数字化复杂事务。由于血缘关系的内生黏性，这一运行过程是由强烈的情感信任所驱动的[4]。老年人在面对线上就医挂号、数字金融理财、跨区域政务办理等技术门槛较高的业务时，天然倾向于向子女寻求协助。子女通过在个人智能终端上绑定老年人身份信息、共享账户密码等方式，将老年人的数字事务内嵌于家庭内部的协作流程中。这种情感驱动的代办机制在极大程度缓解了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的恐惧，提高了事务处理效率。

然而，由于家庭内部规则具有明显的非正式化特征，家庭协助在运行过程中也容易出现授权范围扩张、隐私边界模糊等问题。在缺乏契约理性的家庭场域中，老年人的个人隐私数据与核心权益往往处于相对缺乏防护的状态，从而潜藏一定风险。

3.2. 社区支持机制

随着家庭核心化与空巢老人比例的上升，社区互助型协助关系逐渐成为承接老年事务协助的重要公共支柱。该类型主要存在于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与老年居民之间，其信任基础来源于地缘关系和公共服务信任，相较于家庭协助具有更为明显的公共属性。

社区支持机制主要依托嵌入式服务与网格化管理展开。一方面，社区基层组织、社会工作者通过开设银龄数字课堂、组建一对一志愿帮扶队伍等方式，提供面对面的技术教学与事务协助；另一方面，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保留并优化了线下传统人工窗口，并引入智能化自助终端，由社区志愿者或工作人员协助老人完成高频公共事务的办理。

这一机制不仅构成了政府公共服务的有力补充，更凭借地缘相近、熟人引介的特点，在社区内部建构起一道具有较高接纳度的日常协助防线。但与此同时，由于服务人员流动性较强以及责任边界相对模糊，社区协助在实践中也可能面临责任归属不清等问题。

3.3. 数字平台支持机制

数字平台支持机制是智能时代下技术向老年生活渗透的产物，对应平台技术型协助关系。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推进，各大政务、商业及社交平台纷纷开展适老化改造，尝试从供给侧构建线上事务处理的支持通路。

该类型主要表现为数字平台提供的亲情绑定、远程协助、智能客服等功能。例如，各类手机应用软件推出长辈模式、大字关怀版，并在线上业务流程中引入亲情付、远程协助客服等便民功能。数字平台通过简化交互逻辑、优化操作界面和增强自动化引导能力，降低了老年人参与数字生活的门槛，使其即使不具备完整的数字素养，也能够借助平台技术支持或亲友关联完成线上消费、出行和信息获取等活动。

这一机制显著提升了老年人使用数字服务的便利性，同时也增强了其对特定技术系统的依赖程度。然而，与家庭和社区支持不同，平台技术型协助具有较高的技术介入特征。由于平台规则复杂、算法运行过程不可见，老年人在使用过程中仍可能面临新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从而形成数字化环境下新的事务协助风险来源。

4. 老年事务协助结构性风险分析

为切实揭示老年事务协助风险的现实生成过程，本研究设计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围绕数字代办场景、代际互动模式、权限授权行为、老年人风险感知、纠纷处置经历五大核心维度开展调研。访谈样本采取差异化抽样，覆盖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形态、养老模式的老年群体，同步访谈子女、社区网格员、养老机构从业者等协助主体，共访谈 16 位老年人、8 名协助者，采取一对一线下深度访谈形式，全程录

音整理访谈文本，形成一手质性资料，最终筛选 4 组典型案例展开归纳分析。经分析发现，老年事务协助风险并非源于单一主体的主观恶意，而是在家庭信任扩张、代际数字能力差异、智能技术场景嵌入以及多元代理链条延伸过程中逐渐形成。

4.1. 家庭亲缘关系中的信任扩张风险

案例一：子女代办模式下的数字身份过度授权

李某，72 岁，退休职工，长期居住于城市社区。由于退休后较少接触智能手机应用，对线上医疗预约、移动支付以及银行 APP 操作较为陌生，日常数字事务主要依靠儿子协助完成。最初，儿子仅帮助其下载安装应用程序、完成线上挂号等简单操作。随着协助次数增加，李某逐渐将手机支付密码、银行卡绑定信息以及部分账户登录权限交由儿子保管。在访谈过程中，李某表示：“孩子懂这些，我也不懂，让他帮忙比较放心。”[2]然而，长期全权代办模糊了权责边界，李某已难以区分普通日常操作与资金、账户相关的高风险财产类操作。一次儿子利用其手机帮助购买金融理财产品时，李某并未充分了解产品性质，只认为孩子帮我处理肯定没有问题。

该案例反映出家庭协助关系中的信任结构扩张问题。家庭成员之间基于血缘形成高度信任，但这种情感信任容易替代必要的制度约束，使老年人在长期依赖过程中逐渐放弃对事务处理过程的主动参与。原本以提高便利性为目的的辅助行为，最终可能演变为对数字身份和财产事务的事实控制。

4.2. 数字能力差异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风险

案例二：社区数字服务中的老年信息弱势

王某，78 岁，独居老人，文化程度有限，主要依靠社区工作人员帮助办理线上社保认证、医疗缴费等事务。由于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王某在办理相关业务时通常由社区志愿者代为操作。在一次社区服务过程中，工作人员帮助王某下载某生活服务应用，并提示需要授权部分个人信息。由于页面文字较多且涉及隐私条款，王某无法理解具体内容，只按照工作人员指导完成点击确认。事后，王某并不知道自己授权了哪些信息，也无法判断这些信息将被如何使用。王某表示：“他们让我点哪里我就点哪里，我也看不懂。”[3]虽然社区工作人员并不存在主观恶意，但由于双方数字能力存在明显差距，实际操作过程中形成了由协助者掌握信息解释权、老年人被动接受结果的信息结构。

该案例体现了数字时代背景下，社区互助型协助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老年人面对复杂数字界面和专业化隐私规则时，往往无法完成有效的信息识别，只能依赖协助者进行解释和操作。在这一过程中，协助者不仅掌握事务执行权，同时掌握信息筛选和解释权，致使老年人从事务主体沦为被动配合者，丧失业务风险辨别能力，无法及时察觉代办流程中潜藏的隐私侵害隐患。

4.3. 数字技术嵌入导致的潜在风险

案例三：智能消费场景中的算法诱导与信息风险

陈某，69 岁，退休教师，居住于城市社区，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但因为较少接触互联网商业平台，对智能手机应用中的复杂功能并不熟悉。在其使用智能购物平台购买生活用品的过程中，平台根据其浏览记录和消费习惯不断推送健康产品、保健食品以及金融类服务信息。由于平台页面采用大字体推荐、限时优惠提醒以及“专家推荐”等营销方式，陈某认为这些内容属于平台筛选后的可靠信息，并多次购买相关产品。后来，在家人帮助其检查手机应用权限时发现，部分应用长期获取其位置、通讯录以及消

[2]受访者李某(72 岁，城市社区退休老人)：半结构化访谈记录，2026 年 6 月，笔者访谈。
[3]受访者王某(78 岁，城市独居老人)：半结构化访谈记录，2026 年 6 月，笔者访谈。

费记录等信息，而陈某此前并不了解这些授权内容的具体含义。陈某表示：“手机上的东西越来越多，我知道要点确认，但是不知道确认以后到底意味着什么。”[4]虽然平台并未直接实施显性侵权行为，但数据授权条款晦涩、算法运行逻辑不透明，陈某无法知晓个人信息采集、分析与流转路径。

该案例体现了平台技术型协助关系以算法推荐、智能服务和数据支持为基础，通过技术手段降低老年人参与数字生活的门槛。该类协助具有较强的技术嵌入性和便利性，但也使老年人逐渐形成对数字平台的依赖。由于平台运行规则和算法逻辑具有隐蔽性，老年人与平台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老年用户可能因难以理解数据授权内容，而面临个人信息泄露和隐私保护风险。同时，算法推荐和商业化运营可能影响老年人的消费判断，增加被诱导消费的可能。由此可见，平台技术型协助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数字风险，需要通过强化信息透明和权益保护机制加以规制。

4.4. 多主体协助中的委托代理风险

案例四：养老服务链条中的责任模糊风险

张某，81 岁，农村迁居城市老人，由于子女长期在外工作，其日常事务主要依靠社区养老服务人员和网络平台共同完成。例如，养老金资格认证由社区工作人员协助操作，线上医疗预约由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帮助完成，部分生活消费则通过平台绑定亲属账户解决。在一次医疗缴费过程中，由于系统更新导致支付失败，张某认为是养老机构操作问题，而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则认为问题来源于平台系统。随后，平台客服要求老人联系绑定账户的家属进行身份确认。整个业务流程涉及老年人、异地子女、社区工作人员、养老机构、数字平台多方主体，但由于不同主体之间缺少明确的信息交接和责任划分，最终导致问题长期无法解决。张某表示：“每个人都说自己只是帮忙的，但出了问题不知道找谁。”[5]

该案例体现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链条扩张风险。在现代养老服务体系中，老年事务已经不再局限于家庭内部，而是逐渐形成家庭、社区、机构和平台共同参与的多层代理结构。然而，多主体参与虽然提高了事务处理效率，也增加了责任界定难度。当授权行为无书面留存、各代理主体缺少标准化对接流程，一旦出现操作失误、信息泄露、财产受损等问题，多方主体极易相互推诿，最终由抗风险能力最弱的老年人承担全部损失。

从委托代理理论的深层逻辑来看，本次质性访谈发现的老年事务协助风险，可进一步归纳为非正式代理关系中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双重结构性问题，这也是四类场景风险的底层理论内核。其一，道德风险源于监督机制缺失。协助者获得老年人事务代办权限后，因老年人缺乏实时监督、全程甄别能力，部分协助者会基于自身便利性简化操作流程、扩大操作边界，在未充分沟通的情况下替代老年人决策，引发越权操作、隐私泄露、财产受损等风险。其二，逆向选择源于筛选机制缺失。老年人选择协助主体多依赖亲缘、地缘等熟人关系，无标准化的资质审核、能力评估、信誉筛查机制，无法甄别协助者的专业能力与责任意识，导致部分规范意识薄弱、服务能力不足的主体进入协助体系，从源头埋下风险隐患。

5. 优化路径

在积极老龄化背景下，提升老人群体事务参与的安全性，弥合数字鸿沟所带来的事务协助风险，需要打破主体间的壁垒，构建政府统筹、平台企业协同、社区落地、家庭支撑、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协同社会支持网络，凝聚老龄治理合力[7]。同时，要坚持政府、社会、家庭、个人共同参与、各尽其责，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传统美德，打造老年友好型社会。

第一，化解老年事务协助中的结构性风险，首要任务是推动社会支持网络的理念重构与功能对调。

[4]受访者陈某(69 岁，城市社区退休教师)：半结构化访谈记录，2026 年 6 月，笔者访谈。
[5]受访者张某(81 岁，城乡迁居养老老人)：半结构化访谈记录，2026 年 6 月，笔者访谈。

必须扭转将老年人单纯视为技术保护客体的陈旧观念，推动家庭、社区、数字平台的支持模式从全盘替代向适度辅助转型[5]。在协助行为的开展过程中，应始终坚持老年人决策为主，协助者操作为辅的根本原则。外部支持网络应侧重于提供环境赋能与工具补给，通过微调交互界面与强化代际多模式沟通，最大限度保留老年人在事务处理中的自主意识与控制权，阻断因过度代办引发的行为替代风险。

第二，作为承上启下的中观枢纽，社区支持能力的提升需要走专业化与规范化并举的道路。首先，应当积极推进标准化服务流程建设，制定社区助老代办、上门协助服务的行为准则与责任免责清单，明确社区志愿者与网格员在协助老人操作智能设备时的行为禁区。其次，聚焦专业化协助能力培养，通过定期开展信息安全培训，提升基层工作者的数字伦理素养与反诈防骗甄别能力，使社区支持网络不仅具备人情温度，更具备抵御新型技术诈骗的专业硬度。

第三，数字平台应当将社会责任深度嵌入算法研发与界面设计的底层逻辑之中。一方面，应持续简化操作流程，坚决剥离诱导下载、隐性捆绑和带有误导性的自动化推荐机制，减少适老化改造中的软性技术歧视；另一方面，应当在软件交互中强化提示机制，利用人工智能语义分析技术，对涉嫌财产风险、隐私越权的协助操作进行高频、醒目的语音异响警示[3]。

此外，数字适老化治理不仅需要依靠技术优化，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规范。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6]已搭建个人信息处理基础规则，但针对亲属代办、社区志愿协助、平台亲情授权等老年特殊代办场景，尚未细化多方主体权责条款。因此，未来可以进一步完善老年数字权益保护规则，明确协助主体的信息使用范围、平台审核责任以及违规操作责任。同时，数字平台应建立适用于老年用户的特殊保护机制，例如针对异常账户授权、大额支付、敏感信息调用等行为设置风险提示和人工审核程序，以降低技术环境中的隐性侵害风险。

第四，规范协作边界，完善非正式委托代理机制是规避核心风险的关键。为此，需要从技术嵌套与制度设计两个层面发力。在技术层面，首先需清晰划分权限边界，针对金融交易、政务认证、医疗隐私等高风险业务，通过系统弹窗引导双方建立限时、分项、有限授权的契约思维，杜绝无期限、无范围的全权口头委托。其次应当强化知情确认机制，数字平台及办事终端应当引入面向老年委托人的双重验证或大字版知情同意弹窗，在关键节点必须由老年人本人通过语音、简易手势或专属提示进行最终确认，确保委托人享有实质的知情权。最后应当提升协作透明度与建立可追溯机制，依托操作日志留痕技术完整记录代办全流程，生成简洁易懂的操作明细，实现每一笔资金变动、每一次权限调整均可查询、溯源，为厘清多重代理中的责任边界提供坚实凭证。

在具体制度设计方面，可以探索建立数字事务协助的分级授权机制。例如，在手机应用程序和公共服务平台中设置不同权限等级，将事务协助区分为信息查询、操作辅助、事务办理以及重要事项决策等不同层级。对于一般性信息查询和操作指导，可以允许协助者直接参与；对于涉及金融支付、医疗信息以及身份认证等高风险事项，则应要求老年人本人进行二次确认。通过分级授权设计，可以避免传统“一次授权、长期有效”的粗放模式，使协助关系由完全信任模式逐渐转向有限授权模式，在保障事务办理效率的同时维护老年人的自主权。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智能时代与老龄化社会纵深交织的特殊历史交汇点上，老年事务协助已成为弥合银发数字鸿沟、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必然选择。然而，老年事务协助过程中所暴露出的隐私泄露、财产侵害及决策替代等结构性风险，绝非单一协助主体的个体行为偏差，而是由外部社会支持结构的无序扩张、

[6]https://www.cac.gov.cn/2021-08/20/c_1631050028355286.htm

技术环境的信息黑箱以及微观委托代理关系的非正式化共同交织作用而成的系统性后果。过度情感信任、代际数字信息鸿沟、代办权责边界模糊三重因素交织，共同催生各类老年事务协助风险。

面对这一系统性挑战，单纯依靠技术优化或道德劝导难以从根源化解风险。未来的老龄治理必须将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的“参与”与“安全”双重价值相统一。通过重塑社会支持网络的功能定位，实现从全盘替代向适度辅助的理性回归；此外，在技术底层和管理流程中引入规范化的契约留痕与知情确认机制，筑牢委托代理关系的制度底线；同时，协同推进社区服务的标准化建设与数字平台的伦理化适老治理。只有凝聚家庭、社区、平台与制度的合力，将规范与关怀双轮驱动，才能真正消解事务协助中的结构性技术反噬，全面保障老年人在智能时代的数字自主权与数字化生存安全。

参考文献

[1] 李宏洁, 张艳, 杜灿灿, 等. 积极老龄化理论的国内外研究进展[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22, 42(5): 1222-1226.

[2] 周慧珺, 邹文博.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鸿沟的现状、影响与应对策略[J]. 当代经济管理, 2023, 45(3): 60-67.

[3] 刘晨晖, 白士煊, 董新宇. 智能时代老年群体数字安全风险的层级分化、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基于数字素养的视角[J]. 人文杂志, 2025(8): 132-140.

[4] 温欣. 家庭自主性: 老龄社会的家庭化应对与家庭制度重塑[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27(1): 91-100.

[5] 曾兴, 王潇翼. 老年人新媒介素养的主体性逻辑与社会支持机制研究[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4, 46(3): 148-155.

[6] 解亘. 老年人财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反行为[J]. 当代法学, 2014, 28(3): 94-101.

[7] 吴旭红, 何瑞, 吴朵. 双向赋能: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银发鸿沟”的破解之道——基于南京市 J 区“智慧养老”实践案例的研究[J]. 电子政务, 2022(5): 19-30.